

北京文学理论学会文选



陈新权 著

当代中国认识论



当代中国认识论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

当代中国认识论

陈新权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当代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是，思想进程同社会历史进程的紧密相随。1949年以来，中国哲学的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在认识论方面出现过两次高潮。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认识论研究中逐渐生长出相互联系四个倾向，即开放倾向、分析倾向、多维倾向和主体性倾向。在实际生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日益走向多样化的情况下，与上述四种倾向内在相关的全面系统的学术探讨，将导致我国认识论在内容上的系统更新和体系上的多样化。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我国认识论未来发展中将会出现的一个“新的高潮”。

当代中国认识论

(1949—1986)

陈新权 著

责任编辑：敬 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4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800册

ISBN7-301-00639-X/B·055

(平)定价：4.75元

出版说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科学研究空前活跃,学术活动空前繁荣,新观点、新理论、新学科不断涌现,老学科不断拓展。置身于教学和科研活动之中的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勤奋钻研,努力进取,成果累累。

为了支持扶植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向老一代学者求教,发扬北京大学学术优势,促进学术梯队建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我们编辑出版《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以下简称《文库》)。

《文库》以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及在读博士研究生为主要作者对象,力求反映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优秀科研成果,以推动青年学者高层次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为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改革作贡献。《文库》各种著作的写作在老一代学者的指导下,以老带新、新老结合,传统学科与新学科、传统理论与新理论交互渗透、交融,向祖国和人民展示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水平,以最新学术成果服务于改革和开放,造福于祖国和人民。

《文库》的著作力求做到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新颖的内容、体裁和研究方法,典雅健康的语言文字。

为了编好《文库》,我们特聘请一些著名学者为顾问,编委会负责确定选题,组织评议书稿、审稿等具体工作。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顾问

王 瑶 王铁崖 厉以宁 朱德熙
杨周翰 季羨林 陈岱孙 苏志中
沈宗灵 费孝通 周一良 张岱年
张广达 张玉书 胡代光 黄楠森

主 编：晏智杰

副主编：彭松建 董学文

编 委：

王 东 王 宁 王思斌 平新桥
宁 骚 冯 棠 齐海滨 阎步克
陈 义 张文定 张京华 张晓秦
晏智杰 董学文 彭松建 睢国余
谭卫东

序

这是一本研究全国解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在我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的专著,象这种系统研究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其一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史的著作在我国尚不多见,本书是一次开创性的探索。

前几年社会上就流传过“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尤为人所津津乐道。我则认为经济确实繁荣,哲学未必贫困。这里不拟分析上述说法的片面与夸大,我只想指出,人们在读过本书之后,一定可以得出结论,认识论并不贫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为我国体制改革开辟了宽阔的道路,也为我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展现了诱人的前景。十年来,同其他学科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被认真地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许多禁区陆续被打破了,各种观点都可以自由讨论了,哲学论著的学术性大大加强了,哲学学术论著的数量超过前三十年总和的若干倍,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尽管哲学宣传、研究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和问题,但整个形势是前三十年不曾出现过的。这种形势长期延续下去,并进一步发展,再有一二十年我国就可能出现能充分代表时代精神并对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巨著和哲学大师。对于哲学这种远离经济基础、高度抽

象、但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作过高过急的要求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时候，对十年来以及解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其一个分支学科的传播、研究、发展的历史作一番探索和总结，肯定其成就，品评其不足，预测其前景，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本书认为近四十年来认识论的发展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而现在正处在第三次高潮的前夕。作者以四分之三的篇幅来评介十年来认识论发展的概况和基本倾向，并把这些倾向概括为四种，即开放倾向、分析倾向、多维倾向和主体性倾向，认为这些倾向不仅是同过去的封闭倾向、满足于宏观考察的倾向、单线决定论倾向和片面强调客观性的倾向相反的，而且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时代的要求，因而形成了认识论发展的新阶段，为新高潮的到来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作者的概括和对许多观点的品评不一定都很中肯、很准确，但作者所作的努力，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但在前六十年间，除党的领导人而外，广大哲学专业工作者的工作仅仅限于宣传和解释。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无疑是哲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我们不研究它，不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不推动它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怎么能宣传好呢？而研究、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哲学工作者的份内之事。广大哲学工作者广泛从事这项工作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其中当然也包括认识论的研究。作者对认识论的发展作这样一番回顾，对它更迅速更健康的发展无疑

是有益的。哲学的其他部分,如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等等,情况都类似,也有必要回顾一下它们近四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以便推动它们更迅速更健康地发展。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研究综合起来,必将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其建立和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主要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最初偏重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长期停留在这种状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无疑应该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历史,其中无疑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不研究过去,当然弄不清当代;不研究当代,也不能深刻了解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到了转移重点的时候了,本书作者开了一个好头。

希望作者的预见能早日实现,而且不仅出现认识论的新高潮,也出现其他哲学学科的新高潮。

黄楠森

1988年4月21日

前 言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哲学理论。它关心诸如下列这样一些问题：知识(包括信念)的先决条件和基础，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知识的一般可靠性，知识的本质及其影响，……。无论认识论同哲学的其它部分(如本体论、逻辑学等)处在怎样紧密的联系之中，无论整个哲学体系怎样安排，认识论总可以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和相对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着自己独立的对象。所以，认识论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一个部分。“广义认识论”(哲学即认识论)的看法，如果指整个哲学都可以成为人们的认识工具，对人的认识产生影响，是有意义的；如果以为除认识论之外，再无哲学，则毕竟太偏狭了。正是因为认识论所涉问题的特殊性，使它成为哲学中与人类现实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个部分。认识活动是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紧相联系的，认识是人的本性的一种表现，关于认识的理论必定要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向前发展，这就是近代以来，认识论倍受重视的基本原因。

当代中国认识论，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认识论，最近四十年来，人类认识活动蓬勃发展，认识水平迅速提高，与之相应，认识论方面的新观点新体系层出不穷。然而，中国认识论的状况如何呢？常常有人会问：当代中国有认识论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

题。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充足的理由来论证当代中国是有认识论的，而且，这种认识论在中国的社会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上述问题的真正含义在于，当代中国认识论是否为人类的哲学宝库增添了闪光的颗粒，这实在令人难以作答。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就世界范围而言，当代中国认识论迄今未能产生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影响。那末，中国认识论的未来又会怎样呢？对未来的推断不能离开对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本文的目的正在于对当代中国认识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并进而对中国认识论未来发展的一般可能性作出预测。

导言：哲学背景

当代中国认识论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在对“部分”（当代中国认识论）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应该对“整体”（当代中国哲学）有一粗略的把握。

当我们着手考察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哲学时，我们遇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千头万绪，无从下手。面面俱到的罗列和事无巨细的描述既不可能，亦徒劳无益。因此，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视角，而这依赖于对当代中国哲学特点的认识和把握。

一个简单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当代中国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有党性的，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理论；它是占统治地位的，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理论。它的状况、它的发展，同国内外政治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实践的需要、政治的影响一般可以决定哲学理论的内容和观点的倾向。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同一条原理在不同时期具有的不同内容，往往都有直接的实践和政治背景。例如，什么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以前，常见的有下列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只有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二是认为不仅斗争性，同一性也可以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三是认为斗争性和同一性都不能孤立地成为动力，只有二者的结合统一才可以构

成事物发展的动力。其中,第一种观点更为流行,且愈到后来愈占优势。这显然是与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视相适应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是唯斗争独尊。1976年以后,重新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主要的倾向是为同一性在发展动力方面寻找地盘,否定“斗争哲学”。这同宣布阶级的消灭,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自然不无关系。此类例子可谓俯拾即得,举不胜举。讲哪一条原理,强调哪一方面,多讲一点儿量变,还是多讲一点儿质变,强调批判,还是强调继承,重视决定作用,还是重视反作用,……,都直接间接地同政治、同现实社会生活的变迁相联系。哲学争论,多数情况下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

但是,当代中国哲学并非全无学术性质。在后面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虽几经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在增强。尤其是近几年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探讨和历史考察并进,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兼顾,学术探讨的空气很浓。当代中国哲学具有两重性质,它被作为一门科学理论来研究,但它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二者既统一,又矛盾。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应当抓住的一条主线。

与这条主线相适应,当代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的关系同样可以成为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中国人是受俄国革命的启发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个基本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二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第二方面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列宁和斯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1360页。

大林的原著，一是苏联其他理论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发挥。1949年以后，上述复杂的情况逐渐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马恩列斯原著中的思想为指导，以当时的苏联哲学为榜样，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学习、运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一是把马恩列斯原著中的思想直接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学习、运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是着力突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这两种倾向经历了矛盾统一，结合分离的曲折过程。当然，最终还是后一种倾向获得了优势。这是同国内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苏关系的状况相适应的。同理，中国哲学同欧美哲学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哲学的关系，也有着直接的社会历史背景。

当代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是，思想进程同社会历史进程的紧密相随，哲学事件同政治事件的密切相关，据此，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当代中国哲学的第一阶段(1949—1957)

1949年7月8日，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认为：成立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目的是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传播马列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以期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批判和吸收旧哲学遗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对于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批判。这个哲学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是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而发生的，是紧随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的；它的宗旨反映了夺取全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哲学战线上面临的迫切任务。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集中代表了当时中

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当代中国哲学应当以这一事件为起点。当然,这个起点不能在孤立的意义上理解,必须和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考虑。

为全面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1949—1954年,哲学战线的工作基本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这种宣传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①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主要是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的:

出版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方面是大量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著作并编写和出版对其进行阐释的书籍;另一方面是大量出版毛泽东的著作,目的在于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输入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当时,苏联哲学仍然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源泉之一。在这段时间的中国哲学中,苏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教学方面,在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影响都很大,甚至占据着垄断地位。当时,几乎没有出版中国学者自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党校、大学都主要由苏联专家讲授着苏联学者编写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大量引进当时的苏联哲学,对于宣传普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了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状况,对于培养专业的马克

^①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给李达的信》,《中国哲学年鉴》(1982)第2页。

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苏联哲学在内容上的诸多缺陷,在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宣传和普及必然要求通俗化。1949年,艾思奇在《从头学起》一文中强调,要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后,艾思奇出版了一些通俗性的哲学著作,撰写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哲学论文。李九夫在怀念艾思奇的文章中指出,艾思奇在理论工作上的贡献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也即较好地解决了下述两个问题:一是哲学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二是哲学怎样做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①。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在通俗化方面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另外,杨献珍、冯定、胡绳等许多哲学工作者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撰写了介绍学习体会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哲学道理,或对照自己的思想问题,或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谈自己的理解,说明书中的道理怎样回答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类似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促使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被庸俗化的倾向也是与此直接相关的。

对唯心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是与正面宣传普及马克

^①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41页。

思主义哲学相映照的。首先是1951年进行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认为，《武训传》宣扬了唯心史观，应当开展关于这部电影及有关著作和论文的讨论。^①1954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对所谓《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毛泽东认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没有引以为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的奇怪事情。因此，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②这种批判逐步演化为对胡适哲学思想的全面批判。随后，还进行了对胡风文艺创作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批判。这些批判对于强化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中的地位，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中隐含着对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的争论采取行政干预的倾向。企图通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突击性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1954年以前，哲学领域里的学术争论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当然，1950年，关于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还是三个的问题曾进行过讨论，1953年曾对巴甫洛夫的两个信号系统学说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讨论，但这些讨论未能得以展开和深入。当时，主要工作是宣传性、普及性的。

1955年以后，哲学界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普及仍然是主要的工作。但是，在宣传和普及的同时，探讨和研究也在深入和发展。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艺术和学术问题上的方针。这对哲学界来说，无疑也是一股温暖的春风。哲学研究工作的进展，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4页。

学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方面，苏联学者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书籍，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多，而且水平也有所提高，并已开始尝试性地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问题，编写了教学大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教科书中较好的一本。这本书为编写更为成熟的教科书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实现的变革，哲学界开始着手研究西方哲学史。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也开展起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学术讨论空前活跃。1955年到1957年，先后对飞跃的形式、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世界的基础是什么、如何评价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性质等许多问题开展了讨论。因为我国当时正处在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各项事业的发展相对比较顺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历史哲学方面。相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这个时期讨论的重点。其中，意义较为深刻、影响较大的是对下述两个问题的讨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的性质”。

我国过渡时期并存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成份。这种状况显然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蓝图不相一致，因为后者是以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于是，如何认识我国当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征，便成为一